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高兴 / 主编

我的金饭碗

[捷克] 伊凡·克里玛 / 著

刘星灿 /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Jan Klíma

我的金饭碗

Ivan Klíma

[捷克] 伊凡·克里玛 / 著

刘星灿 /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金饭碗 / (捷克) 克里玛著; 刘星灿译.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4.10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 第2辑)
ISBN 978-7-5360-6922-0

I. ①我… II. ①克… ②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捷克—现代 IV. ①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9547号

合同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1—086 号
MY GOLDEN TRADES
IVAN KLÍMA
Copyright: © Ivan Klima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詹秀敏
丛书策划: 肖建国 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 李倩倩
责任编辑: 孙虹 黎萍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书 名	我的金饭碗 WO DE JINFANW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375 2 插页
字 数	193,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本书中文专有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我的金饭碗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支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①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姿态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

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

杂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伯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回味无穷的大饼

(中译本前言)

刘星灿

评介伊凡·克里玛这部作品，让我追忆联翩、感慨万千。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与伊凡·克里玛便同在布拉格查理大学文学院学习，只不过那时我们几乎互不相识。因为不同班，他是我的高班学长，我们只是见面点个头、道个好而已，算是一种面熟人不熟的关系吧。巧的是他当时的恋人、如今的妻子海伦娜却是我的同班同学。整整五年，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学习，直至一九六〇年毕业。海伦娜有着一头漂亮的金发，总是面带微笑，很是招人喜欢。她弹跳轻巧，我们两人在班上较优异的体育成绩，自然增加了我俩关系的亲密度。当时，全班同学都知道她同伊凡相恋，但都没对伊凡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他当时只是一个

内向、腼腆，不爱与人尤其是陌生女孩主动交往的大学生。直到毕业后，他一直在文学杂志社或出版社当编辑，并不断发表自己的作品，逐渐成为一位较有声誉的作家。出于我与他妻子作为同窗好友的自然交往，也出于我一直关注和翻译捷克文学的专业需要，我与伊凡·克里玛的关系也自然密切起来。我每次赴捷访问，在看望好友海伦娜的同时自然与伊凡·克里玛有了进一步的接触，而每当我在他们家做客，与海伦娜、伊凡坐在一起交谈时，我都发现伊凡仍是那么腼腆，甚至有点羞怯，几乎全是海伦娜热情满怀、滔滔不绝地在叙述、在提问；伊凡则笑眯眯地坐在一旁静听，连插句话的情况都很少有。可有趣的是“一同上山采蘑菇”的建议却是由伊凡·克里玛主动提出来的。海伦娜忙接着说：“你知道吗？星灿，采蘑菇是伊凡最喜爱的活动之一。”我即使再迟钝，也能意识到这位腼腆的老学长难得表现出的“主动”，是他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友好情谊。当然要去啰！我们在他家附近的一座森林里足足转了两三个钟头，大概是因为天气没对上号，我们没有遇上雨后天晴长蘑菇的日子，结果三个人中只有我采到了唯一的一朵小蘑菇，真可谓战果“辉煌”！可我一点儿也不感到遗憾，因为我的心思本来就不在采蘑菇这件事上。与伊凡·克里玛在安静的树林中的近三个小时的交谈，却让我直接从他嘴里听到了有关他的不凡经历和叙述。我的“你从小就爱采蘑菇吗”的一个并不经心的提问，引来了他关于他不幸童年的断断续续的叙述：“我的童年哪有采蘑菇的福分啊！”“一九四一年，也就是在我刚刚十岁那年，我和我妈妈还有三岁的小弟弟便住进了特莱津法西斯集中营……”“就在那时候，我因不准上学，胸前还不得不戴上犹太人必须戴的星徽记号，从而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后代，第一次感到比谁都矮了一截，十分见不得人。”“因为吃过战争年代的大苦，对后来遇上的不论多大的苦，也就能平静地应付了……”现在想来，他在作品中的那种平静，原来是来源于他在经历大劫大难之后所表现出的大彻大悟。我对他那不温不火的平静性格自然更增添了几分理解。对于这一点，在读

他的这本《我的金饭碗》时就会让你深有感触，那哪是他的什么“金饭碗”，哪是他所干的什么开心行当啊！那分明是在苏联入侵与占领捷克之后，伊凡·克里玛在当时捷克傀儡政府对捷克知识分子、作家们的高压统治下不得不改行干的、与作家身份八竿子打不着的倒霉行当。他们不许发声，不许出书，被迫劳动改造，去当递送员、当司机、测量土地、挖“古董”……伊凡·克里玛甚至还干过在书中尚未提到的烧锅炉工、医院清洁工，干着推车运送血迹斑斑的外科病号手术衣物等最脏最累的活儿。可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却听不到伊凡·克里玛的哀声诉苦，看不到他怒火满胸膛的愤慨激昂；有的只是平静叙述、娓娓道来。

但就在这不一般的平静叙述中，却让你不得不为“集体掩埋”这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为无时无地不存在的“尾随”、“盯梢”、逮捕、搜家等恐怖行为感到心惊胆战……

我真觉得，伊凡·克里玛这部作品犹如一块大饼，初尝不甜、不咸、不淡，但细细品味则越嚼越后味无穷。

我不想在此多啰嗦。谨默默奉上这块饼，请您细嚼慢咽，便能品尝出它深层的滋味。

二〇一三年四月四日

目 录

CONTENTS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总序） / 高兴 / 1

回味无穷的大饼（中译本前言） / 刘星灿 / 1

画家梦 / 1

偷运 / 25

考古 / 49

司机 / 71

递送员 / 99

土地测量助理员 / 141

画家梦

一大清早我就决定出门。今天看上去会是个好天气。我妻子要一直工作到晚上，家里虽然安安静静，只我一个人在家，但我还是啥也写不出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感到该写的都已经被人家写过了，所有的故事都被人家讲完了、拍摄完了或者表演完了，而我也许还摸不着门儿。别人说出来的大部分事情，我即使有一百个脑袋，也打听不到。

今年冬末我的画家表妹建议说，明年全年她将住在共和国的另一端，我们可以使用她在乡下的那所小房子。表妹很漂亮，个头也非常小，她的那所小房子跟她一样小巧玲珑。我唯一不满意的是小屋坐落在公路旁边，打那儿过的小轿车、大卡车，还有拖拉机，成天跑个不停，而且还有一条铁路经过那里，火车就在小屋的窗子底下呜呜叫着。不过只要我决心一下，往背包里塞进几本书和几片抹好黄油果酱的面包，抓紧时间赶到火车站，个把小时就能到达那里。

最让我期待的是，按表妹所说，附近住着的尽是一些有趣的人。比方说：紧挨着我们的那栋房子，不久前搬进了一对茨冈夫妇，也许我能从他们那儿发现些有趣和新鲜的故事。

小屋里满是表妹的画作，跟它们的作者一样每幅都小小的。画面上尽是一些各式各样的怪物、巫婆和吸血鬼之类的东西。它们或在空中和废墟上蹿来蹿去，或在地下室里横竖乱爬，或探头从窗户口张望那些紧紧拥抱着的惊恐恋人。在表妹所有的抽屉里、桌面上都推着颜料、铅笔、炭笔和其他绘画所需的用具。我若想重拾在很久以前曾经

有过但已放弃了的爱好的话，就尽可以将这些绘画用具利用起来。

从孩提时起，我就羡慕和渴望这门能够描绘世界和人，用五颜六色来表现一切的技巧。我曾下决心：要是当不成医生或者作家，我就去当一名画家。然而我的一生却完全没有按照我预先设想的轨迹来发展。在战争年代我没法上学，除了饱受牢狱囚禁之苦^①，没有受过任何专业方面的训练。这一切恰恰发生在作为一个人最能长见识的时期；可同时，也正是在战争年代，我虽被关在集中营里，却有幸觅到了难得的几张纸和更加珍贵的水彩颜料。那是最便宜的颜料，一种用一只洋铁盒子装着的十二种颜色，我很快就发现，几种颜色一混合还能变成另一种新的颜色。那时我见到什么就画什么：军营^②的墙壁，领取食物的长龙队伍，被驱赶的扛着箱子和包袱的可怜百姓……我当时对透视毫无概念，但我注意到军营那长长的墙壁通到远处便仿佛汇成了一点，我就照着这个感觉来画，画面上的军营立即变得更真实。这一发现让我兴奋不已，于是我便更加起劲地画着房子和墙壁，直到纸用完了为止。

战争刚结束时我就相信自己将成为一名画家，这时候军营已从我脑子里消失。我画得更多的不是房屋，而是我同学的肖像，通常是在我最不喜欢的“公民课”或我那没有半点天赋的音乐课时，在课桌下偷偷为那些与我关系最亲密的同学画像。很快我的才干使我和同学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甚至连姑娘们——如果我肯把画好的像送给她们的话，她们也乐意为我坐下来当模特儿——当然是穿着衣服的。肖像画将我与大家的关系拉近了，这是我最渴望的。试想还有比当一位画家更美的梦想吗？

① 伊凡·克里玛是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法西斯关在集中营里。

② 集中营的所在地曾是一所旧军营。